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LIUZHENYUN YANJIU

刘震云研究

禹权恒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刘震云研究

禹权恒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震云研究/禹权恒编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7-5649-1901-6

I. ①刘… II. ①禹… III. ①刘震云-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2004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韩 琳

责任校对 舒慧敏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室

电 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70千字

定 价 6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刘震云研究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 1 编选说明
-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刘震云 俺村、中国和欧洲
- 7 刘震云 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
- 14 刘震云 文学梦与知识分子
- 20 周 昱 刘震云 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
- 27 刘 颀 刘震云 一个作家身后的“蓄水池”——刘震云访谈
- 37 张 英 刘震云 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
- 47 李书磊 刘震云的勾当
- 50 孙 郁 刘震云其文

研究论文选辑

- 55 白 烨 生活流·文化病·平民意识——刘震云论
- 61 陈晓明 漫评刘震云的小说
- 65 王必胜 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刘震云小说主题论
- 74 李 扬 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
- 79 摩 罗 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
- 96 姚晓雷 刘震云论
- 116 周昱波 走不出语言的层峦叠嶂——刘震云新世纪小说创作一瞥
- 124 梁 鸿 论刘震云小说的思维背景
- 132 郑 春 试论刘震云小说的文体形态
- 141 马俊山 刘震云：“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
- 150 董之林 回到文本：刘震云小说的“双声话语”及其他
- 159 程光炜 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 173 宋剑华 论《一地鸡毛》——刘震云小说中的“生存”与“本能”
- 185 张新颖 乱语讲史 俗眼看世——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漫评

- 191 董之林 向故事蜕变的历史——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及其他
- 198 李敬泽 通往故乡的路——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
- 208 陈晓明 故乡面与后现代的恶之花——重读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
- 223 李建军 尴尬的跟班与小说的末路——刘震云及其《手机》批判
- 230 陈晓明 “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
- 250 张清华 叙述的窄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
- 257 孟繁华 “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 261 贺绍俊 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作品年表

- 269 刘震云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77 刘震云研究资料索引
- 304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俺村、中国和欧洲

刘震云

——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接触欧洲,是从身边的生活用品开始的。直到现在,中国人划分世界还用两个概念:“西方和东方”。西方是指欧洲和北美,东方是指中国和中国附近的国家。由于水的关系,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还用另外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随着西洋人对中国的入侵,他们不但带来了物质商品,也开始播种精神之花。精神产品的主要代表是宗教。一百多年过去,在我的家乡,仍有一部分人在信仰天主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精神产品的输入,不像自行车和洋皂的输入那么便宜。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就留下许多笑话。他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头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牧师:“愁不找主,你找谁呢?”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牧师:“主马上让你成为一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神层面的激烈冲突,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融合到一起的。在中国生长开花的西方的精神产品,也是跟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相互妥协和因地制宜的结果。就像韩国菜到了中国,中餐去了西方一样,都已不是原来的味道。我曾把这个意大利牧师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表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敬意。

三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但反映在宗教等精神层面,更多的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两条河流交汇到一起时,误会便会油然而生。当然,误会会产生许多冲突,但误会也会推动双方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误会会产生许多乐趣。生活中没有误会,就像生活中没有正义和真理一样,马上会显得暗淡无光。1993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过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阿克曼:“德国北方。”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威兹珀:“南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四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看似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论,还是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一个根本的例证是,东方人看世界,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西方人看世界,恰恰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

到整体。譬如讲,我从小长大的村庄,用中文来表述,就是: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而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在信封上的表述是:老庄村王楼乡延津县河南省中国。两者的表述,是截然相反的。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它证明在两者的目光里,相互已经把对方的世界颠覆了。2009年夏天,我在欧洲住过两个月。九月份的时候,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这不是对一条河的判断,而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哲学的不同。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你随便问一个村人,村边河水的深度,他都会马上给你答出来。他不会考虑春夏秋冬,他关心和想到的,就是当下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不知道精确的深度,也会说:“大概两米吧。”或者:“大概两三米吧。”知道这种差别后,我就不再难为麦润,不再追究莱茵河水的深度了。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五

说到文学,我十分理解亚洲当前存在的焦虑: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学。但我要非常遗憾地说,单说到文学,起码在中国,从来没有以欧洲为中心过。从时间上讲,西洋文学来到中国,比洋灯洋布洋车和洋皂晚多了,比西方的宗教也晚多了。日常用品和宗教,从19世纪中叶,就随着洋枪洋炮大踏步地涌入中国,而西洋文学来中国走亲戚,却是20世纪初的事。20世纪初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给外域文化和文学在中国的擂脚,提供了方寸之地。但是,当时能走到中国来的欧洲文学,并不是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老古董和老人家,如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会,总会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快被东洋鬼子也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入侵给打破了。当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文化和文学的功能就会脱离文化和文学本身,而转到社会和民族的层面。那时在中国最流行的是“抗战文学”,也就是描写中国人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战争的文学。中国现在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那时文化和艺术的集中体现。于是,西洋文学的幽灵,仅仅在中国停留了片刻,就被东洋鬼子的枪声给赶回了老家。接着是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

倡的是“革命文学”。应该说,20世纪50到60年代,欧洲文学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这时的欧洲文学,指的不是以英、法、德、意为中心的欧洲,而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前苏联。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苏联作家的名字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的大街上,开始跑欧洲的汽车;中国的家庭里,开始有欧洲生产的电视和电冰箱;欧洲文学和欧洲的作家,才随着这些汽车和电冰箱来到了中国;中国读书的人,才开始知道萨特、加缪、普鲁斯特……但是,这些欧洲作家在中国的时运也不济,因为美国文化,如豺狼虎豹一样,也紧跟着来到了中国。他们的步伐可比欧洲文化和欧洲作家快多了。因为他们的文化大多是商品,于是很快像汽车和电冰箱一样,全面占领了中国的文化市场。如今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如果他生长在城市,他从小吃的肯定是肯德基和麦当劳,电视里看的是NBA,电影院里看的是好莱坞大片。如同上世纪初,洋车洋皂来到我们村一样,这一代是吃美国物质和文化的奶长大的。欧洲的文化和文学,跟他们几乎没有交叉过。欧洲文化和文学,仅仅生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欧洲已经衰落了,所有的年轻人,都到美国去留学。欧洲,仅仅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六

我想说的是,文化和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文化和文学的兴盛,与创作者有关系,但是,跟时代、民族和民族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更有关系。就好像但丁和莎士比亚必定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必定产生在20世纪的法国一样。如果说,在全世界的范围看,从过去到今天,文学以欧洲为中心是一个事实,那就证明,欧洲确实产生了如萨特、加缪、普鲁斯特这样伟大的作家,并具备产生这些伟大作家的社会和生活条件。摆脱和克服这个中心是没有用的,更明智和有趣的做法是,如何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创造条件,产生出如萨特、加缪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或比他们更伟大的作家。今年二月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办了第21届冬季奥运会,女子花样滑冰项目,过去都是以欧洲为中心,今年,韩国的金妍儿,就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打破的方式非常简单,她跳得比别人好,拿到了世界冠军。

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三十一年前我来到北大，胸前抱着一个大木箱子，身后背着一个我妈给我包的包袱。当时的车站在建国门火车站，那个车站有个毛病，就是进站的火车得绕一个弯，就像有些人评价我的作品特别绕，然后我就进了北京。

坐上北大的校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坏了！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天安门在北京的北面，毛主席是坐北朝南看着他的故乡湖南和他的母校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的，但是我一看，毛主席却坐在南边，往北边看着，我就知道我转向了，这一转，转了三十一年。我本是个糊涂人，现在在北京，需要在糊涂上面再糊涂一次，才能恢复世界的本来面目。有人说让我往东，我肯定往西，因为往西就是往东；有人让我打狗，我肯定打鸡，因为打狗就是打鸡。李敬泽老师有时候叫我吃饭，他如果说在蓟门桥的南边，我往北边走就好了，如果往南边的话，永远走不到，等我走到的时候，可能饭菜全都吃光了。

我在北大碰到的第一个人，现在是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叫李维一，是维一把我领到了北大。他是北京人，说普通话，他的普通话听起来很好听，但我当时却梦回宋朝，心想如果在宋朝的话，北大肯定在汴州，我们家就在首都的郊区。那么我说的就是普通话，李维一之流说的则是土语。现在他对台湾同胞喊话，他的名字起得也非常慎重，李维一。

进了北大以后，我住在三十二楼，第一次睡上铺，因为在我们村，没人睡上铺。有人问我，你住的是别墅吗？我说我现在住的不是，但是小时候是，因为我们村的人家家住别墅，而且有院子。在北大，则是六个人住一个房子。

刚才蒋朗朗先生送给我一个同学录，我看到78级的同班同学中，敬泽是80的吧，几乎都是全国的状元或者各省的状元才能进北大中文系。我很不幸，是河南的状元，敬泽很荣幸，是河北的状元，我们班就是全国的状元。我们是在北大中文系最鼎盛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进的北大。据我所知，现在北大中文系很少有状元了。我们班有四个人已经去世了，当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除了“逝者如斯夫”，还想说，这就像一个瞬间，一个悲伤的瞬间，同时也是迷人的瞬间。

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同学中，有一位是陕西人。十五年前，我到西安去的时